

### 编者按:

文学经典是人类各个时代的文学成就的标志和文化精髓的体现。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都是由一系列文化经典所构成的。换句话说,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弘扬的历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文学经典的流变和传承的历史。与此同时,一个民族真正意义上的经典往往会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对其他民族的文化进程产生影响。外国文学经典既是外国文化精髓和民族精神的体现,对中外文化交流以及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革新及国民精神的塑造发挥了积极影响。在当今世界文化呈现多元交融和分化的大背景下,研究外国文学经典的形成、流变和传播,不仅对于拓展中国外国文学研究新领域新空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国国家文化建设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为鼓励国内学界开展相关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于2010年重大招标课题《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以浙江大学吴笛教授为首席专家的浙江外国文学研究团队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一举中标。该课题旨在研究外国文学经典在源语国家的生成以及在译入语国家的跨文化重生,在探讨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的理论问题的同时,重点研究其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媒体改编和跨媒体流传。浙江传媒学院彭少健教授带领该校相关教师承担了该课题子项目《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近代卷)的研究任务。本刊从本期开始设专栏陆续刊发该项目部分阶段性研究成果,以飨读者。

## 论《瓦尔登湖》在美国本土的经典化生成

韩德星

**摘要:**《瓦尔登湖》是美国作家梭罗的代表作,在美国及世界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该书能成为一部经典作品,与美国十九世纪的历史文化语境以及梭罗个人的生命历程直接相关,具体可概括为四个因素:一是超验主义运动,该书是超验主义的核心文本;二是自然文学写作,该书是美国自然主义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并具有深远的生态学意义;三是乌托邦社团运动,该书是对个体乌托邦的成功书写,宣扬了一种独特的生活哲学,契合了美国人的伊甸梦想;四是废奴运动,梭罗的“英雄”角色及其身后的文化地位也对该书的经典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瓦尔登湖; 经典化; 超验主义; 自然书写; 个体乌托邦

**作者简介:** 韩德星,男,副教授,文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 I712.0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552(2012)06-065-11

《瓦尔登湖》是美国作家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的代表作,该书曾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评为“塑造读者的25本书”之一,在《美国遗产》杂志所列的“十本构成美国人性格的书”中位列榜首。这也意味着《瓦尔登湖》不再仅仅是一部书,一部文学作品,而是作为一种追求理想生活的特立独行的精神融进美利坚民族不断涌动的血液中,如马克·凡·道伦所说:“毫无疑问,‘瓦尔登湖’精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融入美国意识中,粘在美国人的嘴唇上,长在美国人的神经里”。<sup>[1]</sup>因此,“在美国的经典著作中,《瓦尔登湖》是最无可争议的正典之一”。<sup>[2]</sup>在今天生态思潮勃兴

的时代，它作为一部“绿色心灵圣经”可谓广为流传，深入人心，其在美国及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业已无可置疑。

不过，在美国本土，对《瓦尔登湖》的经典化接受却经历了一个相对曲折缓慢的过程。该书最初于1854年8月9日由波士顿蒂克纳和菲尔兹公司出版，并很快获得较高评价，据美国学者布雷德利·迪恩和格雷·沙恩霍斯特考证，“到1854年八月底，《瓦尔登湖》事实上已经获得了从缅因到俄亥俄等州的三十多个杂志的赞赏……在查找到的66篇当时的评论文章中，有46篇都是高度赞赏的。”<sup>[3]</sup>该书头版印了2000册，第一年就卖出了1744册。尽管如此，当时的美国读者对这本书的思想和风格并不十分理解，认为它是一部散文诗，“有古典的优雅，新英格兰的质朴，以及一点点东方的华丽”，“有时让人感觉那么新颖，有独创性，有时又让人感觉怪里怪气”，<sup>[4]</sup>事实上，人们只是把它看作是一个还算不错的读物，而并不理会作者的哲学观与生活方式，只是将之视为怪异而不切实际的想法。当时最流行的读物是小说和游记，而梭罗写作《瓦尔登湖》恰恰是要挑战这两种文体及其读者，他声明自己要谈的是和本地读者密切相关的事情。在1862年梭罗死后不久，蒂克纳和菲尔兹公司又重印了《瓦尔登湖》，但销量并不好。梭罗生前虽然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受到一小批人的追随和崇拜，但大多数人并不真正理解他，就像不理解超验主义一样，而一些大牌作家如爱默生、詹姆斯·罗塞尔·罗威尔、惠特曼以及英国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等人的一些负面评价影响了人们对梭罗的看法，导致对《瓦尔登湖》等作品的接受十分有限，因而，梭罗这一时期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自然文学领域。不过，1893年，波士顿还是出版了10卷本的《梭罗文集》，1906年，扩至20卷。20世纪的前二十年，美国出现了一股重新评价本土文学与文化的潮流，约翰·梅西、范·威克·布鲁克斯、瓦尔多·弗兰克等一批文学批评家对由惠特曼、布莱恩特、朗费罗、罗威尔等人构成的狭隘、文雅的文学经典传统表示不满，希望用粗犷的、真正具有本土特色的作家如惠特曼、梭罗、马克·吐温来取代他们，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美国的大学开始普及对十九世纪美国文学的教育和研究。<sup>[4](25-26)</sup>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梭罗的简单生活哲学受到推崇，《瓦尔登湖》进入更多人的视野。诺曼·福斯特、沃浓·帕灵顿、雷蒙德·亚当斯等人在各自著作中都对梭罗做了一定的研究，而弗朗西斯·奥托·马西森1941年出版的《美国文艺复兴：爱默生与惠特曼时代的艺术及表现》第四章对《瓦尔登湖》的结构与语言风格做了认真地分析，并且批驳了罗威尔的观点。该书对奠定《瓦尔登湖》在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年，瓦尔特·哈尔丁教授发起成立“梭罗协会”，该协会是目前研究单个美国作家的最大也是历史最长的一个组织。到了五六十年代，梭罗作为文化反叛者的形象受到“垮掉的一代”及嬉皮士的喜爱；另外，由于马丁·路德·金的影响，梭罗的公民不服从思想深入人心；随后全球生态思潮兴起以后，梭罗又被尊为世界环境保护运动和生态主义的先驱，《瓦尔登湖》则成为一部公认的“圣约”。

当然，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除了历史的机遇和认可以外，更主要的是由于其内在的文学艺术价值与思想文化内涵，如果回到《瓦尔登湖》本身及梭罗所处的时代，我们认为影响其经典化生成的因素主要有四点：一是超验主义运动，梭罗是其重要成员，而该书形成于超验主义运动鼎盛期，是梭罗将超验主义理念与自身现实生活相互融合的结晶，可谓超验主义核心文本之一；二是自然文学写作，该书是美国自然主义散文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并具有深远的生态学意义；三是乌托邦社团运动，该书是对个体乌托邦的成功书写，宣扬了一种独特的生活哲学，契合了美国人的伊甸梦想；四是梭罗自身的人格魅力及其在废奴运动中“英雄”般的举动也对其著作的经典化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

## 一、《瓦尔登湖》文本的生成与美国超验主义运动

美国超验主义运动源于本土的唯一神论派内部，很多成员皆该派牧师，有的辞掉了牧师工作，超验

主义运动的产生意味着传统的宗教拯救模式已经跟不上现代社会的精神需求。刘小枫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基督信仰的根基已不再是救恩经验，而是宗教性的道德生活观，这要求神学向伦理学的转移”。<sup>[5]</sup>美国超验主义运动可以看作这种转移的体现。一般来说，该运动的起点是1836年9月8日，当时正值坎布里奇的哈佛大学建校两百周年庆典，爱默生、亨利·赫奇、乔治·普特南、乔治·里普利几个老校友在威拉德旅馆相遇，他们决定以后定期聚会，共同探讨大家关心的各种问题。第二天，爱默生就匿名发表了影响深远的《论自然》一文，被视为超验主义运动宣言书。爱默生等人发起的俱乐部被称为超验主义俱乐部，在其内部，则根据发起人亨利·赫奇的名字称之为赫奇俱乐部，活动一直持续到1843年，网络了许多精英，也包括伊丽沙白·皮博迪和玛格丽特·富勒这样杰出的女性。该俱乐部未设固定场所，有时就在康科德镇爱默生家聚会，梭罗1837年从哈佛大学毕业以后回到家乡康科德任教，很快就和爱默生等人熟识并成为朋友，自然就加入该俱乐部，并一度协助爱默生编辑俱乐部杂志《日规》，在上面发表诗文。

1841年，梭罗关闭了和哥哥约翰共同主持的康科德学院，随后两年，迁入爱默生家中做类似长工的活，其间曾试图买下一个破落的农场，梦想到弗林特湖边生活，未果。1944年，爱默生为了保护康科德镇附近的瓦尔登湖的美景，在湖边买了一大片土地，并同意梭罗在湖边筑屋居住。1845年春天，梭罗开始自己动手建造木屋，并于美国独立日7月4日搬进小屋居住，到1847年9月6日，离开小屋，梭罗在湖边共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又两天。

梭罗在湖边筑屋而居，虽然有着种种的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受了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的影响。早在哈佛求学时，梭罗即阅读过爱默生的《论自然》。在该文中，爱默生极力提倡告别二手的传统，直面大自然，“保持一种与宇宙的原始联系”。<sup>[6]</sup>在他看来，大自然是精神的象征，更接近真善美，“我在荒野里发现了某种比在大街上或村镇里更为亲昵、更有意味的气氛。在静谧的田野上，尤其是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人看到了某种像他的本性一样美好的东西”。<sup>[6](10)</sup>自然的美可以召唤出人性内在的美，同时，“在自然界永恒的宁静中，人又发现了自我”。<sup>[6](15)</sup>梭罗到湖边去正是为了追问什么是真正的生活，人生怎样度过才是有意义与有意思的，以及如何发现和塑造真正的自我。这些同样是《瓦尔登湖》要澄清的基本问题，也是美国超验主义者进行文化批判的切入点。

《瓦尔登湖》的写作始于湖边生活的第二年，或许如瓦尔特·哈尔丁教授所言，当梭罗开始住在湖边的时候就萌生了要写一本有关湖边生活的书，<sup>[7]</sup>等到1847年离开的时候，梭罗已经基本完成了初稿。1849年5月，梭罗同样写于湖边的《在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上一周》在波士顿詹姆斯·芒罗公司出版，在该书后面声明作者的第二本书《瓦尔登湖》亦即将出版，但由于《河上一周》销量不佳，《瓦尔登湖》并未及时出版，直到1854年，才由波士顿的另一家出版社蒂克纳和菲尔兹公司出版。在这期间，梭罗七易其稿，认真磨砺，改动很大，美国学者林顿·斯坦利在《〈瓦尔登湖〉的形成》（1957）一书中对此做了专门研究，按照他的说法，梭罗从1839年4月8日至1854年4月9日的日记中摘用了不少的文字，这一点与爱默生十分相像，另外，书中的引文是在后来的几稿中才添加上去的，章节的分配直到出版前一年才定。虽然梭罗对该作品做了多次繁复的修改，但“其最本质的特性从头至尾都未改变”，<sup>[8]</sup>因此，即使梭罗在1849年就出版该书，那也会是一本很好的书，因为“梭罗从一开始就做得很好”。<sup>[8](55)</sup>

在《瓦尔登湖》中，梭罗将自己两年的生活浓缩为一年，开始于夏季，并依次进入秋、冬和春天，由此形成生命从绚烂、死亡到重生的一个象征意义上的循环，一个“魔圈”。梭罗不但在象征意义上使用年月的轮回，也多次使用了从早晨到晚上的一日轮回，时间和自然世界的种种意象承担了表达与批判等诸多功能。这种将自然世界精神化的特点正是超验主义的一贯风格，但是同样表达对人、社会、生活、自然的认识，与爱默生的《论自然》相比，梭罗的《瓦尔登湖》更具有有机的生命力，更有血

有肉。正如学者们认识到的,爱默生与梭罗的著作都是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但爱默生却戴着面具,读他的书遭遇的是一个思想的头脑,一双锐利的眼睛,一个发出声音的面具,就像《论自然》中那只“透明的眼球”,“我不复存在,却又洞悉一切”,而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呈现的是一个完整的“我”,在思索,也在行动,在生活。从这个角度来看,《瓦尔登湖》更具有可读性,离读者的想象与身体更近。

正是结合自己的湖滨生活,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形象地阐述了超验主义的生存哲学,从而使该书成为超验主义流传最广的一部著作。美国学者克鲁奇曾经把该书的内容归为四类相互区别又互相关联的事情:1. 大多数人所过的平静而绝望的生活;2. 造成人们糟糕生活境况的有关经济问题的谬论;3. 亲近自然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种生活会给予一个人什么样的奖赏;4. 人们应该追求的“更高的原则”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sup>[9]</sup>对于前两个问题,梭罗在该书的前两章,尤其是“经济篇”中,做了认真的分析。他指出周围的同乡或年轻人因为继承了农庄而把自己变成了土地的奴隶,被生活的重担压得透不过气来,“大多数人,甚至在这个较为自由的国度里的人,也由于无知加上错误,满脑子装的都是些人为的忧虑,干的全是些不必要的耗费生命的粗活,这就造成了他们无法去采摘生命的美果”。<sup>[10]</sup>这些人不知什么是不朽与神圣,整天提心吊胆,卑躬屈膝,“心甘情愿地认定自己是奴隶和囚徒”,<sup>[10](365)</sup>从而过着听天由命、忍气吞声的绝望生活。梭罗清楚看到,人们为现实物质利益所羁绊,无法领会生命的快乐,无法提升和丰富自己的精神与灵魂,其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了美国清教徒式的劳动观、职业观与财富观,即后来马克斯·韦伯所论述之新教伦理孕育的资本主义精神,一种世俗的拼搏与奋斗,不过是陷入经济利益的陷阱,而不知道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为此,梭罗认为人们应该将生活简单化,再简单化,抛弃那些不必要的奢侈品和所谓使生活过得舒适的东西,而去追求一种内在的精神生活,一种“简单、独立、高尚和信任的生活”。<sup>[10](372)</sup>只要过简朴而智慧的生活,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谋求自立就不是苦事,而是快乐的事。对于第三个方面,梭罗通过自己的生活指出了一条“人的自然化”的道路,自然化不是彻底回归自然或一种原始主义,而是认识和领悟自己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存在,并且领会当下的重要性和永恒性。在他看来,大自然不像人类社会那样充满种种邪念和卑劣之物,充满奴役、虚伪和利益的纠缠,它是健康而充满活力的,可以让人领略生命的美好,将人升华到更高的境界里去,“人类要是能感受到万春之春的影响力正在唤醒他们,他们必然会上升到一个更高、更加升华的生活中去”。<sup>[10]</sup>(397)对于第四个方面,梭罗在《瓦尔登湖》“更高的规律”篇中有专门的表述,其实是对歌德笔下“浮士德难题”的一个回应。他谈到人的天性中既有动物性、野性的一面,也有精神性、神圣纯洁的一面,我们的整个生活就是这善、恶两方面在个体内部永不休止的斗争,正是通过这种斗争,人不断战胜卑劣的自己,成为一个日益高尚的人,“那个确信他身上的兽性一天天地消逝,而神性不断地成长起来的人是有福的。”<sup>[10](564)</sup>梭罗虽然一贯称自己是异教徒,但在这一点上,美国清教传统禁欲主义的影响仍可窥一斑。当然,梭罗提倡禁欲又不同于一般清教徒为了积累财富、勤俭节约的目的,而是为了改造自我,不断提升自己的生命境界。

总之,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宣扬了一种反世俗、反物化的超验主义生存原则,其核心思想是背离所谓常态生活而不断提升自我、完善自我的个人主义精神,或者说,他的这部作品将超验主义强调神性的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强调自由的个人主义融为一体,并赋予其有形的结构与具体的生活内容。由此,梭罗与导师爱默生在这一奠定美国文化基石的超验主义运动中表现出不同的品性与影响,“如果说爱默生是要唤醒国人,从旧世界的文化阴影中脱身,求得一种精神上的独立,梭罗则要人们摆脱旧的生活方式的奴役,求得一种生活中的解放”。<sup>[11]</sup>

## 二、《瓦尔登湖》与美国自然文学写作

美国文学史家罗伯特·斯比勒指出,超验主义和自然主义是美国十九世纪文学的两大运动,前者

“以人与神明和道德法则的关系这些概念为基础”，后者则“以人与自然和自然法则的关系这些概念为基础”。<sup>[12]</sup>其实，二者之间并非可以截然分开，从我们对梭罗与爱默生的论述中不难看出这一点。而且，美国自然文学的传统也一直存在着将自然与心灵融为一体的观照方式，如18世纪的清教神学家、作家乔纳森·爱德华兹，“美国植物学之父”约翰·巴特姆及其子威廉·巴特姆等，都把自然看作上帝的伟大作品，将对自然的瞻仰与尊重看作是对神的崇仰与膜拜。这些先驱对梭罗与爱默生等超验主义者产生了很大影响。

不过，同是超验主义者，梭罗与爱默生毕竟不同，如劳伦斯·布伊尔所说，爱默生应该是“哲学的，或至少是神学的”自然主义，<sup>[13]</sup>将自然精神化，道德化，而梭罗后来越来越偏离了爱默生的自然观，既注重吸收自然对其精神的滋养，又充分尊重有别于人类文化的自然本体。居住瓦尔登湖时期的梭罗正是自然观发生转变的重要时期，他在1846年8月份的缅因森林之行认识到自然的非人格化的一面，对荒野的理解突破了此前的主观化倾向。因此，布伊尔认为《瓦尔登湖》既是梭罗自然观转化的结果，也意味着这种转化的过程。<sup>[13](118)</sup>在该书中，“我”作为自然中普通一员与禽兽为邻，大自然是活生生的生命世界，而不是感伤的或理念的，或神学与道德的越位性的象征，连春天解冻泥土的涌动在他看来也是有生命的，他借隐士独白：“我非常接近于与万物的本质化为一体，这是我一生中不曾有过的。”<sup>[10](568)</sup>不再是人化的自然，而是自然化的人，这是《瓦尔登湖》描写的基本主题。因此《瓦尔登湖》既是一部超验主义的著作，又是一部自然文学经典。事实上，哈尔丁教授指出，梭罗同时代人更多的是把《瓦尔登湖》视为一部自然史来读的，他们甚至跳过去《经济篇》、《更高的原则》和《结束语》这样一些重要的篇章，抛弃掉了梭罗的生活哲学。<sup>[7](63)</sup>他们这样做固然是对梭罗以及超验主义的不理解，但也反映了梭罗书中引人入胜的自然主义风格。

就整个美国自然文学史来看，《瓦尔登湖》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和里程碑式的作品。自然对美国人及美国文化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对美国人而言，确立自我与自然的关系是整个民族性的问题，早期殖民者在与大片原始荒野的抗争与妥协中学会了如何与自然共存，因此，“自然一直被认定为美国民族自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sup>[13](33)</sup>美国文学评论家彼得·A·弗里策尔指出：“正是出于早期美国人将自己与其外在环境构成一体的企图，以及他们要使自己 and 所处之地的自然现象和谐共处的努力之中，才产生了当今被人们称为自然文学的美国文学形式。”<sup>[14]</sup>在梭罗之前的美国自然文学也许很难说是纯粹的自然文学，美国学者迈克尔·布兰奇在其著作《追根溯源：〈瓦尔登湖〉之前的美国自然主义作品》中谈到，美国普通读者之所以把梭罗视为自然主义文学的鼻祖，恰恰是因为梭罗之前的自然主义作家身份太混杂，有的作家一边赞美自然，一边大肆屠杀，而他们的作品也大多缺乏科学性和正确的自然观，缺少合理的编排和整理，“自然哲学思想陈旧”，而且更主要的是它们的性质很混乱，很难甄别，如有的就是布道文，宗教宣传册，或者哲学类、历史类、传记类的著作。<sup>[15]</sup>尽管如此，梭罗却还是很早就认识到了早期美国自然历史文学所具有的文学价值与生态史、博物学意义，他对美国早期自然文学作家约翰·史密斯、威廉·布雷德福以及威廉·伍德、科顿·马瑟等人的作品都非常熟悉，而乔纳森·爱德华兹和约翰·巴特姆的思想与著作可以说直接孕育了他和爱默生等人的超验主义自然观。爱德华兹把自然看作心灵的风光，巴特姆把自然浪漫化以及关于所有生物共享一种智能的观念都可以在《瓦尔登湖》中找到影子。

如果按照美国学者托马斯·J·莱昂所说，美国的自然散文只有到了18世纪才成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其趋于成形的标志是威廉·巴特姆的《旅行笔记》，<sup>[16]</sup>那么可以说，梭罗的《瓦尔登湖》则标志着该文体的成熟，并且在对自然的理解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7、18世纪美国自然文学中的自然被赋予了太多宗教的或功用主义的色彩，同时又被认为是粗俗与危险的，甚至具有魔鬼气息，到了19世纪爱默生、梭罗时代，自然才作为精神的殿堂呈现在人们面前，自然文学才有了真正的思想内涵。因

此,正如美国学者唐·谢斯所说,爱默生与梭罗“是现代自然文学的先驱,是把自然史转变为自然文学形式的最主要作家”。<sup>[17]</sup>当然,爱默生与梭罗对自然文学的贡献又是不一样的,梭罗笔下的自然是“一种近乎野性的自然,一种令人身心放松、与任何道德行为的说教毫无关系的自然。在自然中,他寻求的是一种孩童般的、牧歌式的愉悦,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一种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灵丹妙药,一种外在简朴、内心富有的生活方式”,而爱默生笔下的自然是“一种理性的自然,一种带有说教性的自然,一种被抽象、被升华了的自然”。<sup>[11](107)</sup>爱默生试图摆脱清教前辈的影响来直面自然,但对待自然的方式依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前人的痕迹,这与他的牧师经历不无关系。梭罗则更多的以希腊式异教徒的方式来面对自然,以平等的态度理解自然、对待自然,在自然中与鸟兽一起嬉戏。因此,如劳伦斯·布伊尔所言,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恢复了真正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它不同于以往殖民者或种植园主根植于农业背景中的“田园梦想”,而是预示着整个美国自然文学即将把“田园感”与“农业”分离开来,这是早期自然文学所不具备的,<sup>[13](127)</sup>而我们不妨把此看作是梭罗将自然进一步“去文明化”的重要举动。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无疑创造了一种整体主义的生态理念,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天、地、人、神”四位一体的生存状态,自然不再只是人们认知和审美的对象,更是孕育健康肉体 and 健全灵魂的母体,人是并不完美而需要不断完善的自然之子。在《瓦尔登湖》中,梭罗已经开始建立一种类似于当代德国思想家史怀泽所说的广义的生命伦理观,这不仅是自然生态论,同时也是一种生态人类学,因为归根结底,生态问题必须回到对生命的理解上,回到对人类文化自身局限性的批判上来。在这一点上,他与当今的创造论神学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其实,在那样一个高扬主体性的浪漫主义时代,梭罗不仅高扬主体性而且反思了人的主体性。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是《瓦尔登湖》对当今生态主义思潮与环境保护运动影响深远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绿色的自然观与生存观,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所透露出的地域感,即深深扎根于一处山水对个体与自然关系的深度书写,对后世的自然文学家也影响至深。在他之后,约翰·巴勒斯在美国东部卡茨基尔山,约翰·缪尔在美国西部优胜美地山区,玛丽·奥斯汀在欧文斯河谷,奥尔多·利奥波德在威斯康星河畔“木屋”,安妮·迪拉德在汀克溪旁,亨利·贝斯顿在科德角的“水手舱”,……一一铺展开他们的自然文学画卷。约翰·巴勒斯被称为“一个更为友善的梭罗”约翰·缪尔被称为“心醉神迷的梭罗”与“西部的梭罗”,爱德华·艾比被称为“现代的梭罗”,这些后世的自然文学作家沿着梭罗高扬的自然主体性的道路继续前行,而他们笔下的自我则越来越趋于淡化,自身的人格隐没在对自然的朴实的描述中,生态与环境成为自然文学真正的主角。布伊尔称梭罗是“美国最好的、最有影响的自然文学作家”,<sup>[13](351)</sup>看来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 三、《瓦尔登湖》与美国乌托邦运动

19世纪,美国同样受到了欧洲传来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欧文、傅里叶等人的思想在40年代初进入美国,所以当超验主义运动发展起来的时候,乌托邦社团运动也同时在开展,并对超验主义运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如与爱默生一起发起超验主义俱乐部的乔治·里普利,在1841年春天,和妻子索菲亚一起创建了著名的乌托邦社团——布鲁克农场,而另一位超验主义重要改革家、教育家布朗森·奥尔科特也领导了果园农场公社。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生活同样是一种超验主义的乌托邦实验,美国学者理查德·弗朗西斯将之与布鲁克农场和果园农庄并列为超验主义的三大乌托邦,称布鲁克农场是“规模巨大的企业”,果园农庄是“联合式的家庭”,称梭罗瓦尔登湖小屋为“一个人的社区”。<sup>[18]</sup>布鲁克农场全称是“布鲁克农业和教育协会农场”(Brook Farm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and Education),位于波士顿附近的西洛克斯伯里,面积有170多英亩。该农场为股份制企业,成员以入股的形式加入农场,按

照劳动及一定的利息分成，成人与成员的孩子可以接受农场内所设学校（从幼儿园到大学预科及成人学校皆有）的教育。在给爱默生的邀请信中，里普利谈到了自己领导创建该农场的目的：“如您所知，我们的目的就是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建立一种较现状更为合乎人性的融合；以所有个体一视同仁的方式，尽可能地联合思想家和劳动者；通过为每个人提供适合他们兴趣爱好和天赋的劳动，并保护其劳动果实，来保证他们最高的精神自由；通过让所有人享有教育的益处和生产的利润，消除仆役服务的必要性；由此为社会培养心胸宽广、智慧、高素养的人，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可以使一种更为简单和完整的生活成为可能，而不是在我们竞争体制的压力下被裹挟前行……”。<sup>[19]</sup>农场吸引了一批文化名人加入，如作家霍桑一家，著名天主教徒、保禄会创建者艾萨克·黑克尔等人，1844年以后，受傅里叶主义的影响，布鲁克农场发展迅速，吸收了更多的工人阶级成员，并成立了法郎吉基层组织，其性质从原先只不过是“志同道合的精英们自谋生路的避难所”变成了“农业与工业生产急速发展的中心”，被视为“国民社团运动的旗舰”。<sup>[20]</sup>但好景不长，由于资金短缺，又节衣缩食斥资盖建中心大楼，而该楼在1846年被一场大火烧掉，该农场终于在1847年垮掉。果园农庄（Fruitlands）由布朗森·奥尔科特1843年7月创建于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县哈佛镇的怀曼农场，面积有90英亩（实际开发只有十多英亩），只有一栋破旧的房子和一个谷仓，成员只有14个人，他们过的几乎是唯精神至上的禁欲主义与素食主义的生活，最终没有熬过北方寒冷的冬天，在6个月以后就草草收场了。

布鲁克农场与果园农庄只是当时美国近百个乌托邦公社的缩影，是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人道主义改革运动的一角。无论是社团运动，还是梭罗一个人的乌托邦，其反抗的对象是共同的，即当时美国北方蓬勃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与市场革命。美国北方在这一时期处在由殖民时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变期，旧的生存方式被打破，大量人口涌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经济与政治权力联合起来，更多地被商业与工业资本所有者掌控，“这种联合产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靠着对利润的无情追逐来强力驱动的社会”。<sup>[20] (517-8)</sup>一方面是贫富悬殊加大，另一方面是大多数人的生存毫无人性尊严，明确的社会分工和商业利益将个人瓦解得支离破碎，如爱默生说的，“这原初的统一体，这力量的源头，早已被众人所瓜分，并且被分割得细而又细，抛售无贻”，<sup>[21]</sup>“牧师变成了仪式，律师变成了法典，机械师变成了机器，水手变成了船上的一根绳子”。<sup>[21] (64)</sup>梭罗也说过，“人类已经变成他们的工具的工具了”。<sup>[10] (394)</sup>人的极端功能化就是对人性的异化，而乌托邦公社试图以多样性的劳动和生活来化解这种异化，为公社内的个体建立一种完整的更符合人性的生存状态。

尽管对抗的同样是市场、金钱与权力主导一切的自私自利的社会，但梭罗的出发点、采取的策略以及终极目的却与里普利等人不同。后者的出发点是让公民挣脱经济上的贫富不均与政治威权，实现对财产的共同拥有和共同分享，在教育、分配、物质与精神生产等各方面追求公平与公正，如美国学者卡尔·J. 瓜内利里所评价的，这种乌托邦社会主义其实“仅仅是实现共和主义、民主、基督教以及传教士爱国主义之目标的一种更有效的方式而已”，“他们的法郎吉是将常见的资本主义元素，如私有财产、产权与工资变更系统，纳入到一个公共的框架中”，由此，他们并未能以合作社替代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只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更具有社团思想的美国梦版本”。<sup>[22]</sup>这种靠着大家的合作来改良生存的方式是梭罗所不赞成的，他在《瓦尔登湖》中写道，“通常能够行得通的合作总是极小的一部分而且是表面上的；凡是有一点点儿真心真意合作的地方，表面上似乎看不见，却有一种无声胜有声的和谐。要是一个人有信心，他会用同样的信心在任何地方与人合作；要是他没有信心，他便会像世界其他地方那样，继续过他的生活，不管他和什么人结伴”。<sup>[10] (425-6)</sup>在他看来，生活在一起的“合作”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彼此的自由，“我想给我的同伴们交个底说：你们要尽可能长久地自由自在地、不受束缚地生活。把你们束缚在一个农场里，同把你们关进县牢里并没有多大区别”。<sup>[10] (438)</sup>里普利曾邀请他加入农场，他拒绝了，并在日记中写道，“至于那些公社——我想我宁可在地狱中独身，也不愿进入天

堂”。<sup>[23]</sup>当然，梭罗反对社团集体主义既有出于对个体自由的考虑，也有对它的商业归宿的不满，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最终还是落入市场的圈套中，而市场原则培养了人的贪婪与自私，是最损害人性与生命之美的东西，“商业涉及到什么，什么就倒霉；即使经营的是从天堂带来的福音，商业上应有尽有的倒霉事也会紧跟着你走”。<sup>[10](424)</sup>

与这些公社不同，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关注的不是大众物质上的贫困，而是他们精神的迟钝和智慧的贫乏，不是别人对自己的奴役，而是一个人奴役自己而浑然不知，他批驳的是人们所过的那种平静而绝望的生活，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实验来启示人们什么是应该追求的生活。至少，他要为自己找到生活的真谛，“我到林中去，是因为我希望过着深思熟虑的生活，只是去面对生活中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能学到生活要教给我的东西，而不要等到我快要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并没有生活过。我不愿过着不是生活的生活，须知生活无限珍贵；…我要深入地生活，吸取生活中应有尽有的精华，刚强地、像斯巴达人击溃敌人那样，清除一切不成其为生活的东西，大刀阔斧加以扫荡，小心翼翼加以清理，把生活逼到一个角落去，将其置于最低的条件之中”。<sup>[10](444)</sup>梭罗对这种最低的条件做了精心的计算，最后发现“一年中只需劳动约摸6个星期便可满足生计所需的一切开销费用”，<sup>[10](423)</sup>而其余的时间可以用来学习和散步。梭罗终身未娶，养活自己是很容易的，他很清楚多数人与他不同，因此说“我不愿让别人出于任何原因选择我的生活方式；…我倒希望每个人都能小心寻找和追求自己的道路，而不是走着父亲、母亲或者邻居什么人的老路”。<sup>[10](425)</sup>梭罗不愿让人重复自己，而是以亲身试验的方式告诉人们不要只为了挣钱或生存浪费自己的生命，而应该去过一种“朴素而又独立的生活”，一种珍惜自由和“今日之日的重要性”的生活，一种尽量远离商业原则的具有生命诗意的的生活，一种不断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清醒的生活，一种彻底反物质主义的精神生活。

历史表明，梭罗的个体乌托邦实验比那些公社乌托邦具有更为久远的影响和意义，因为他突破了时代的局限，直指现代人类的精神困境，《瓦尔登湖》也为物质崇拜甚嚣尘上的世界保留了一块洁净的领地，这个领地永久性地驻进了每个热爱生命大美的人的心中。在《瓦尔登湖》“结束篇”中，梭罗写道：“至少我从自己的实验中了解到，如果一个人能自信地在他所梦想的方向上前进，争取去过他想象的生活，他就可以获得平常意想不到的成功。他将把一些事抛在后面，超越一个看不见的界限；新的，普遍的，而且更加自由的法则将在他周围和内心自行建立起来；……他可以在生命的更高级的秩序中生活”。<sup>[24]</sup>这就是梭罗的乌托邦梦想，也是他像雄鸡一样极力报晓的内容，这种个体梦想诗学对美国一代代青年的影响是怎么估量也不为过的。不过，如美国学者罗伯特·理查森所说，梭罗的目的并非仅限于个体，其最终指向仍然是社会，他的目标是建构个人主义的精神原则，这种个人主义使未来发展出一种自由公正的社会成为可能。<sup>[20](541)</sup>先完善个体，再完善社会，这是梭罗超验主义乌托邦梦想的基本逻辑。

#### 四、《瓦尔登湖》与“英雄”梭罗

在美国，梭罗不只是一个作家、思想者、博物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先驱，还是一个影响美国政治与历史的英雄与特立独行的改革者，这一独特身份对《瓦尔登湖》在美国的经典化也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46年7月，正当梭罗住在湖边并开始写作《瓦尔登湖》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义深远的的事情，他因反对美国发动墨西哥战争及北方州对南方蓄奴制的纵容而拒交人头税被关进了监狱，第二天因有人悄悄替他交了税而被放出时，梭罗拒绝出狱，试图以这种方式引起周围人的良知和觉醒，但被强行赶出。次年2月，梭罗以此事为背景作了关于“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演讲，1849年以《抗拒政府》为书名出版，死后被改为《论公民的不服从》。梭罗及其家人多年一直支持帮助南方黑奴逃往加拿大的地下交通网，对1851年国会通过《逃往奴隶法令》极为愤慨，当1854年逃亡奴隶安东尼·伯恩

斯在波士顿被捕时，他写下了《马萨诸塞州奴隶制》一文，并于独立日在著名废奴主义者威廉·加里森组织的集会上宣读，后刊于多家报纸杂志。1859年，康涅狄格州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带人袭击弗吉尼亚州哈伯斯渡口弹药库失败被俘，北方的群众甚至很多废奴主义者不理解布朗的举动，觉得他残暴疯狂，精神有问题。梭罗不顾周围人的阻拦，发出请帖，给大家做演讲，为布朗辩护。布朗被绞死后，他在康科德参与组织追悼会，在会上再次演讲向布朗表达敬意。梭罗由此成为美国著名的敢于向政府说不的不合作英雄。

梭罗成为英雄是因为他言行如一，并彻底践行其正义观的结果。爱默生评价梭罗：“如果他蔑视而且公然反抗别人的意见，那只是因为他一心一意要使他的行为与他自己的信仰协调。”<sup>[25]</sup>在对抗政府方面，爱默生自己就没有做到言行一致，他尽管反对政府支持南方奴隶制，多次演讲抨击逃奴法令，但一直在向政府交税。他不赞成梭罗入狱的做法，在日记中写道：“别胡作非为。只要政府对你好，就不要拒绝付钱”。<sup>[26]</sup>而梭罗认为只要是承认黑奴不是合法公民的政府就一刻也不是“我的政府”，如果政府犯了不公正的谬误，那么，虽然“一个人没有责任一定要致力于纠正某种谬误”，“但他起码有责任同这谬误一刀两断”，<sup>[27]</sup>所以他觉得有必要敬告那些自称为废奴论者的人，“必须立即真正地收回无论在个人和财产方面对马萨诸塞州政府的支持，不要等到他们形成多数后再在他们中间执行正义”。<sup>[27](160)</sup>要是政府为此就将他抓捕，那就遵守所谓法律，姑且让它抓捕好了，“在一个不公道地关押人的政府的统治下，一个正义者的真正归宿也是监狱”，“那是一个蓄奴州里的自由人可以问心无愧地生活的唯一地方”。<sup>[27](160-1)</sup>梭罗以什么对抗政府？一个人的良知良心！他说，“我们首先应该是人，其次才是臣民”，“我有权承担的唯一义务就是在任何时候做我认为正确的事”。<sup>[27](155)</sup>

美国学者斯蒂芬·哈恩指出，“根据经典的而非功利的自由主义，梭罗提出了国家的德行和权力与个人的德行和权力相对的问题”。<sup>[28]</sup>其实，不仅仅是相对的问题，或到底谁高谁低的问题，同时在本源上又是同一个问题。因为梭罗不但将个人置于政府之上，而且还为一切的法律、习俗、伦理道德寻找一个更高的更本源性的法则，那就是康德所说的“绝对命令”：“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作工具，而且应该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sup>[29]</sup>这是最符合人性最具有人道主义的律令，它应该是一切政府行为和法律遵循的基本法则，也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法则，如果政府与法律违背了它，遵循这一更高法则的人就有权利去对抗之。当然，梭罗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说：“我并不要求立即废除政府，而是希望立即能有一个好一点的政府”。<sup>[27](154)</sup>有良知的政府归根结底得由有良知的官员组成，政治的道德化才是政府的必由之路。

梭罗后来为约翰·布朗辩护的时候同样秉承着这种超验主义道德观。当时北方的废奴主义者大多赞同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奴隶制的废存问题，所以他们不理解布朗带人杀死支持蓄奴制的匪徒、攻打弗吉尼亚州政府军火库等武力行动。当周围的邻居们以世俗的经验标准去评价布朗或寻找布朗的行为动机时，梭罗表示了极大地蔑视，他称布朗为“超验主义者”，“一个有思想讲原则的人”，这样的人不是心血来潮或一时冲动，也不是为了某种自身的利益，而是“听从于无限的更高的命令”才去做的，这个命令不是来自外部的世界或高高在上的神，而是来自他自身的“内在之光”。<sup>[30]</sup>不过，梭罗赞赏布朗的不只是其良知，也赞赏其血性和激情，如果只有良知而无行动，那不是真正的英雄。

其实，在《瓦尔登湖》中，梭罗对这种独特的英雄观也有很好的阐述。他认识到英雄的形成与人的动物性有双重关联，动物性不仅包括懒惰、贪婪、好色等导致恶行的本性，也包括自卫、斗争的冲动甚至献身等具有积极意义的本性，梭罗把它称为野性，并在《瓦尔登湖》“禽兽为邻”篇中通过对黑蚂蚁与红蚂蚁之战的观察与描写，来隐喻这种本性乃是促成英雄主义的必不可少的动力。事实上，良心与人性中的善本质上是一种软弱的东西，它是一种同情与怜悯，一种恻隐之心，由良心到选择善、恶的行为以及进一步的采取行动需要一种力量或者说激情，这种力量与激情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

于本真的人性或者说人的野性，如果没有这种力量的注入，善良的举动只能是一般性的慈善行为，而决不会成为英雄行为。在布朗事件中，人们对约翰·布朗的正义性或许不乏理解，但是对布朗的暴力手段却大加指责，称他为“疯子”“狂人”“暴徒”，因为他违背基督教博爱原则，但是，梭罗却看到布朗值得尊敬的地方不仅在于他听从了自身神性与良知的呼声，而且在于他身上的血性和激情，他不仅要为布朗拯救黑人的神圣动机辩护，而且要为布朗的“凶残”辩护，认为它是另一种形式的博爱，他说“我更喜欢布朗队长的博爱而不喜欢那种既不摧毁我也不让我自由的博爱”。<sup>[30](1844)</sup>

梭罗在《瓦尔登湖》“更高的规律”篇中侧重描写人性中的动物性或野性，在“禽兽为邻”篇中则侧重描写动物甚至也具有超验的神性，其用意即在于表明任何的个体在其本性之中都蕴含着产生英雄主义的可能性，英雄主义并不是高贵的离我们好像很遥远的东西，它就是万物的毫不矫饰的本性，如他在《河上一周》中所写：“这几个夜晚从农场仓前空地上愤怒地朝月亮吠叫的那几条狗在我们胸中激起的英雄主义超过这个时代所有的公民主张和战时布道”。<sup>[31]</sup>因此，梭罗相信动物性作为最基本的人性，也绝不是天生要作恶的，而应该有天然的更高尚的用途，比如一个青年可能具有猎杀动物的天然冲动与爱好，“他跑到森林中去，开头时是作为一个猎人和渔人的，直至最后，要是他内心深处蕴藏着善良的生命种子，他便会辨认出自己的目标是当一个诗人或一个自然科学家，于是便把猎枪和钓鱼竿置诸背后”。<sup>[10](557-8)</sup>因此，正确的对待动物性的方法不是完全的压制，而是合理的利用，他引用英国玄学诗人约翰·多恩的诗说，“这人多愉快，把内心的野兽安顿到适当的地方，把心田上横生的杂木，砍除复原！”<sup>[10](564)</sup>所以，英雄并不是什么非凡的人，相反，“英雄通常是最简单、最普通的人”。<sup>[32]</sup>但他只是人，而不是被政府奴役的工具，不是没有头脑的社会习俗的顺从者，他要协调好自己的双重本性，最好的使用人身上的神性与动物性，因而成为更具有人性尊严的人。他评价布朗：“在美国，没有人曾如此坚持不懈地、有力地维护人性的尊严，没有人曾如此更坚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人，一个可以与任何政府或所有政府相匹敌的人。”<sup>[30](1840)</sup>

作一个真正的人，完整的人，这是梭罗一生追求的人格取向，也是《瓦尔登湖》、《论公民的不服从》、《为约翰·布朗队长请命》等重要著述中表达的核心思想，是他认同布朗的基石，也是他最终能够成为对美国乃至世界影响深远的人物的前提。谈到布朗的死，梭罗说“以前，美国好像没人死过，因为要去死的话，你首先必须曾经活过”，只有真正活过的人才懂得死的意义，因此，他认为布朗及其同伴“在教我们如何去死，同时也教给了我们如何去活”。<sup>[30](1845)</sup>如果说《瓦尔登湖》是教给人们如何更自然、本然的活着，那么梭罗的政论文就是教人们如何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公民而活着。教给人们如何去活，在这一共同主题下，《瓦尔登湖》与梭罗的其他著作形成了很好的互补性和互文性，因此，要更好地理解他的政论性著作，《瓦尔登湖》依然是绕不开的经典。

作为“公民不服从”思想的现代奠基者，梭罗“在美国社会政治思潮的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全面、深刻的影响，他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强调已成为美国自由传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成为美国精神的主流”。<sup>[33]</sup>梭罗被认为是影响美国文化的第一人，是美国独立精神的象征，是美利坚民族的英雄。不过，我们已经看到，从《瓦尔登湖》到后来的著作，再到“英雄”梭罗，其间有一条清晰的理路。《瓦尔登湖》可谓梭罗走向不朽的起点，每当后人瞩目于这位“古怪”的超验主义者，或试图更好地了解美国文化的时候，必须回到这个朴实而完美的起点上来，这也许就是经典的含义。

#### 参考文献：

- [1] Mark Van Doren. Henry David Thoreau: A Critical Study [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16: 128.
- [2] Linck C. Johnson. "Walde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A], Approaches to Teaching Thoreau's Walden and Other Works [C]. ed. Richard J. Schneider.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6: 28.

- [3] Bradley P. Dean and Gray Scharnhorst. “The Contemporary Reception of Walden” [A], *Studies in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C]. ed. Joel Myerson,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0: 293.
- [4] Martin Bickman *Walden: Volatile Truths* [M].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2: 24.
- [5] 刘小枫. 基督教理论与现代·选编者导言·特洛尔奇. 基督教理论与现代 [M]. 朱雁冰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27.
- [6] 爱默生. 论自然 [A]. 吉欧·波尔泰. 爱默生集 (上) [M]. 赵一凡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3: 6.
- [7] Walter Harding. *A Thoreau Handbook* [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59: 60.
- [8] James. Lyndon Shanley. *The Making of Walden*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6.
- [9] Joseph Wood Krutch. *Henry David Thoreau* [M]. New York: W. Sloane Associates, 1948: 108.
- [10] 梭罗. 瓦尔登湖·梭罗集 [M] (上). 罗伯特·塞尔编·陈凯, 许崇信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6: 364.
- [11] 程虹. 寻归荒野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11: 109.
- [12] 罗伯特·斯比勒. 美国文学的循环·跋·罗伯特·斯比勒. 美国文学的循环 [M]. 汤潮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256.
- [13] Lawrence Buell.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M].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18.
- [14] Peter A. Fritzell. *Nature Writing and America: Essays upon a Cultural Type* [M].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53.
- [15] 迈克尔·布兰奇. 追根溯源: 〈瓦尔登湖〉之前的美国自然主义作品 [J]. 张生珍译. 鄱阳湖学刊. 2011 (5): 107.
- [16] Thomas J. Lyon. ed. *This Incomparable Land: A Book of American Nature Writing* [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9: 38.
- [17] Don Scheese. *Nature Writing: the Pastoral Impulse in America* [M].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6: 22.
- [18] Richard Francis. *Transcendental Utopias: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at Brook Farm, Fruitlands, and Walden* [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2.
- [19] George Ripley to Ralph Waldo Emerson, 9 November 1840; reprinted in Octavius Brooks Frothingham, *George Ripley* [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882: 307–8.
- [20] Lance Newman. “Thoreau’s Natural Community and Utopian Socialism” [J]. *American Literature*, 2003 (3): 525.
- [21] 爱默生. 美国学者 [A]. 吉欧·波尔泰. 爱默生集 (上) [M] 赵一凡, 蒲隆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3: 63.
- [22] Carl J. Guarneri. *The Utopian Alternative: Fourier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M].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9.
- [23] Henry David Thoreau, March 1841, *Journal* [M]. ed. John C. Broderick et al., 8 Vol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1): 277.
- [24] 梭罗. 瓦尔登湖·梭罗集 (下) [M]. 罗伯特·塞尔编·陈凯, 许崇信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6: 652.
- [25] 爱默生. 梭罗 [A]. 爱默生文选 [C]. 范道伦编选. 张爱玲译. 香港: 今日世界出版社, 1978: 172.
- [26] Walter Harding. *The Days of Henry Thoreau*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205.
- [27] 梭罗. 论公民的不服从 [A]. 张礼龙译. 赵一凡美国的历史文献 [C]. 蒲隆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9: 157.
- [28] 斯蒂芬·哈恩. 梭罗 [M]. 王艳芳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67.
- [29] 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 [M]. 苗力田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86.
- [30] Thoreau. “A Plea for Captain John Brown” [A].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Z] (third editi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89, 1: 1835.
- [31] 梭罗. 在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上一周·梭罗集 (上) [M]. 罗伯特·塞尔编·陈凯, 许崇信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6: 35.
- [32] Thoreau. “Walking” [A]. *Henry David Thoreau: Collected Essays and Poems* [C]. selected by Elizabeth Hall Witherell,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 New York, N. Y., 2001: 239.
- [33] 倪峰. 梭罗政治思想述评 [J]. *美国研究*. 1993 (4): 123.